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丛书

研
究
所
國
際
戰
略
研
究
所

THE
ACCIDENTAL
GUERRILLA
意外的游击战

反恐大战中的各类小型战争

[澳]戴维·基尔卡伦 (David Kilcullen) 著 修光敏 王戎 译

FIGHTING SMALL WARS
IN THE MIST OF A BIG ONE

上海人民出版社

THE ACCIDENTAL
GUERRILLA

意外的游击战

反恐大战中的各类小型战争

[澳]戴维·基尔卡伦 (David Kilcullen) 著

修光敏 王戎 译

FIGHTING SMALL WARS
IN THE MIDDLE OF A BIG ON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意外的游击战:反恐大战中的各类小型战争/(澳)
基尔卡伦(Kilcullen, D.)著;修光敏,王戎译.—上
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丛书)

书名原文:The Accidental Guerrilla: Fighting
Small Wars in the Midst of a Big One

ISBN 978-7-208-13603-8

I. ①意… II. ①基… ②修… ③王… III. ①反恐怖
活动-研究 IV. ①D81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25488号

责任编辑 史美林

封面装帧 张志凯

意外的游击战

——反恐大战中的各类小型战争

[澳]戴维·基尔卡伦 著

修光敏 王戎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23 插页 4 字数 315,000

2016年4月第1版 2016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13603-8/E·54

定价 58.00元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丛书”编委会名单

主 编：王缉思

副主编：袁明 于铁军

编委会成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于铁军 王正毅 王逸舟 王缉思 牛 军
归咏涛 石 斌 叶自成 关贵海 朱 锋
范蔚文 罗伯特·罗斯 罗伯特·阿特
陈 昕 查道炯 袁 明 贾庆国 唐士平
梅 然 杰克·斯奈德

纵谙古今韬略 横务天下经纶

自战国至秦汉以来，中国就不乏“纵横家”，即当代所称的战略家。他们多为君王的策士，胸怀大局，熟谙兵法，满腹经纶，长于韬略，果断决策，机智善辩，纵横捭阖。《战国策》、《孙子兵法》等许多经典著作，记录了中国古代丰富的战略思想。现代中国战略家当中，毛泽东的雄才大略和军事思想，至今无出其右者。

西方古代的战略思想源于古希腊、古罗马。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不朽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与《孙子兵法》诞生于同一历史时期。近代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对后来的军事战略思想(包括对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普鲁士德国政治家俾斯麦的外交战略为后人所仰慕称道。

直到冷战时期，国际战略及该领域的研究，还基本上限定于传统的国家安全战略领域，特别是国防战略、军事战略和着眼于结盟与反结盟的外交战略。此前，罗斯福领导下的美国设计了以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为框架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其实就是一种美国至今仍在执行的试图维护霸权的“大战略”(Grand Strategy)，只不过当时还没有做这种界定。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国际战略研究的主要内容则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战略的延伸，即区分敌我友，分析国际形势和力量对比，运用国际资源打击主要敌手，维护国家安全。

科学技术改变了人类命运，国家之间相互隔绝、按照军事强权划分势力范围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全球化大大丰富了国际战略及其研究的外延与内涵。军事战略仍然是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内容，而传统国

家安全也仍然是国家对外战略的重要考虑。但是,随着世界大战阴霾的消散,大国之间大规模战争危险的降低,各国经济相互依存的加深,经济竞争加剧了,全球范围的贫富悬殊扩大了,能源、生态环境、气候变化、公共卫生、跨国犯罪、恐怖主义、宗教冲突等一系列非传统安全问题突出。离开对上述关乎国计民生的功能性、全球性、跨国界问题的研究,今天的国际战略研究就会变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对于坚持改革开放的中国来说,国际战略必须同国家发展战略一起谋划,同步执行。

但是,对具体问题包括公共政策问题的研究,决不能取代国际战略研究。应当看到,全球化越向社会纵深发展,国家利益越多元化,内外政策互动越紧密,形成“大战略”的迫切性就越突出。一个国家的国际战略历来是由其最高决策者来制定的。但是,同过去“伟人时代”不同的是,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和地方部门在参与国际战略的制定,而任何一个部门都有其视角上的局限性。

战略需要综合分析、全局观念、长远谋划、协调执行,也需要深厚的研究基础。对于研究国际战略的学者来说,我们施展才学的舞台越来越宽阔,但知识面的局限性也越来越明显。一方面,古今中外的纵向韬略经纶需要认真学习和总结;另一方面,层出不穷的全球横向新问题有待研究。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旨在促进国际战略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其重点是对当今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以及相关各国的国际战略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公开发表或向有关方面提交有政策含义的、面向未来的研究成果。我们的研究工作致力于为中国的国际战略决策提供智力支持,为教学服务,并引导公众全面、准确、理性地认识国家安全与国际战略问题。我们鼓励跨学科、多重视角的研究课题,力图实现理论和方法论的创新。本丛书将本着开放、包容、谦虚、严谨的学风,寻觅国际战略领域的精品。尚拜求海内外志同道合者,惠赐宏论巨制。

王缉思

2008年新春于北京大学朗润园

致 谢

和其描述的战争一样，本书是一个混合式产物：一部分区域研究加上一部分个人回忆；它或许会因为过于学术而难以普及，也或许会因为过于平民化而难以成为纯学术作品。在战斗活动中、调研旅行中、外交会议中、学术研讨会中，以及政策规划会中，我书写过本书；在酒店里、公寓里、咖啡厅里、图书馆阅览室里、土制的地堡里、装甲的拖车里，我书写过这本书；在朋友们和亲戚们的沙发和餐桌上，我也书写过这本书。我收集了满满一桌用破旧的、布满灰尘的格状“鼯鼠皮”牌笔记本记载的研究笔记，而且前后用坏了三台电脑，它们都没能承受住我的虐待。

尽管书中的错误归咎于我，但是如果没有很多人的支持、建议和评论，本书无法顺利出版。我只能向其中几位致谢，但我希望其余的人——尤其是那些如果被像我这样的人在这样的书中提及姓名就会有危险的人——可以认识到他们的影响并且接受我的谢意。

在我极度焦虑的一段时期，谁也没有预料到，我的家人们一直都在支持我。我的指导老师们，包括埃利奥特·科恩(Eliot Cohen)、汉克·克伦普顿(Hank Crumpton)和戴维·彼得雷乌斯(David Petraeus)，他们的见解在本书中处处可见。特别是汉克，他对我来说远不止是上司而已。我常常忽略的博士生导师卡尔·塞耶(Carl Thayer)，以间或无意的的方式，在长达十年时间里帮助我整理想法的过程中培养我。我的宽容的导师们——埃利奥特，汉克，贾斯汀·凯利(Justin Kelly)，彼得·莱希(Peter Leahy)和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对我古怪想法的理解一直让我感到惊讶。梅根·布拉德利(Meghan Bradley)是一位很好的朋友，也是一位富有洞察力的旅行伙伴，我们曾一起去过一些世

界上最坏和最好的地方。在我需要的时候，弗吉尼亚·帕尔默 (Virginia Palmer) 是个真正的朋友。阿克巴·艾哈迈德 (Akbar Ahmed), 亚力克西斯·阿尔比恩 (Alexis Albion), 迪安·鲍利 (Dean Bowley), 迈克·布伦南 (Mike Brennan), J.B 伯顿 (J.B. Burton), 莎拉·蔡斯 (Sarah Chayes), 克里斯·卡沃利 (Chris Cavoli), 亚历克萨·考特尼 (Alexa Courtney), 奥黛丽·库尔思·克罗宁 (Audrey Kurth Cronin), 帕特里克·克罗宁 (Patrick Cronin), 特里·戴利 (Terry Daly), 戴夫·迪莱格 (Dave Dilege), 托比·道奇 (Toby Dodge), 卡尔·艾肯伯里 (Karl Eikenberry), 安德鲁·埃克萨姆 (Andrew Exum), 本·菲茨杰拉德 (Ben Fitzgerald), 米歇尔·弗卢努瓦 (Michele Flournoy), 罗伯特·福特 (Robert Ford), 汤姆·弗里德曼 (Tom Friedman), 兰迪·甘格尔 (Randy Gangle), 拉塞尔·格伦 (Russell Glenn), 丹·格林 (Dan Green), T.X. 黑姆斯 (T.X. Hammes), 布鲁斯·霍夫曼 (Bruce Hoffman), 弗兰克·霍夫曼 (Frank Hoffman), 迈克尔·霍华德 (Michael Howard), 哈罗德·英格拉姆 (Harold Ingram), 卡尔·杰克逊 (Karl Jackson), 汤姆·约翰逊 (Tom Johnson), 科林·卡尔 (Colin Kahl), 贾斯汀·凯利 (Justin Kelly), 特里·凯利 (Terry Kelly), 鲍勃·基勒博 (Bob Killebrew), 戴尔·库尔 (Dale Kuehl), 伊丽莎白·维塔什维利 (Elisabeth Kvitashvili), 拉里·兰伯恩 (Larry Lamborn), 克莱尔·洛克哈特 (Clare Lockhart), 拉里·勒格雷 (Larry Legree), 乔·莱图瓦勒 (Joe L'Etoile), 汤姆·麦肯 (Tom Mahnken), 斯隆·曼 (Sloan Mann), 卡特·马尔卡西安 (Carter Malkasian), 皮特·曼苏尔 (Pete Mansoor), 吉姆·马提斯 (Jim Mattis), 凯思林·麦金尼斯 (Kathleen McInnis), HR 麦克马斯特 (HR McMaster), 埃里克·迈斯纳 (Eric Meissner), 约翰·内格尔 (John Nagl), 比尔·内格尔 (Bill Nagle), 米克·尼克尔森 (Mick Nicholson), 乔治·帕克 (George Packer), 米歇尔·帕克 (Michelle Parker), 汤姆·里克斯 (Tom Ricks), 巴尼·鲁宾 (Barney Rubin), 马克·塞格曼 (Marc Sageman), 菲利普·卡尔·萨尔兹曼 (Philip Carl Salzman), 纳迪亚·夏德罗 (Nadia Schadlow), 塔米·

舒尔茨(Tammy Schultz),卡列夫·赛普(Kalev Sepp),莎拉·休厄尔(Sarah Sewall),埃琳·辛普森(Erin Simpson),维克拉姆·辛格(Vikram Singh),艾玛·斯凯(Emma Sky),马克·史密斯(Mark Smith),罗布·史密斯(Rob Smith),休·斯特罗恩(Hew Strachan),吉姆·托马斯(Jim Thomas),帕特里克·沃尔特斯(Patrick Walters),迈克·维拉霍斯(Mike Vlahos),福瑞德·扎卡瑞尔(Fareed Zakaria),还有其他许多为本书贡献了十分有价值的见解的人,其中一些见解我希望它们依然能在书中被识别出来。贾宁·戴维森(Janine Davidson)——最好的朋友,灵感来源和红颜知己,她是我的依靠。她是而且永远都是独一无二的。

几位读者和审稿人为这部作品的早期版本提供了详细而十分有用的建议。我的出版商,英国赫斯特的迈克尔·德怀尔(Michael Dwyer),以及牛津大学出版社的戴维·麦克布莱德(David McBride),不断地给予我理解和帮助,杰西卡·瑞安(Jessica Ryan)的决心让我能够一直坚持将本书完成。于是,无论如何到现在,本书终于完成了。

华盛顿特区

2008年12月

前 言

非常奇怪的一点是，我必须离开军队才能参加战争。我已经在皇家澳大利亚军团(Royal Australian Regiment)步兵指挥官的职位上服役了20年，在印度尼西亚指挥过军事顾问团，作为澳大利亚交换教员在排长战斗课程上与英国军队一起教授小组战术(small-unit tactics)。我已经在塞浦路斯岛和布干维尔岛执行维和任务，为波斯湾国家的反恐行动提供建议，并指挥一个连队在东帝汶开展反叛乱行动。在2004年，我在澳大利亚军队总部担任陆军中校，负责分析目前和将来的各种冲突并被临时调派至外交贸易部(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以帮助撰写澳大利亚反恐政策。

由于种种原因，多年来我一直穿行于大亚洲地区(Greater Asia)，并在伊斯兰世界学习村民、部落和市民的风俗习惯及信仰。几乎出于偶然，我已经开始研究存在于各种穆斯林社会中的游击战。我的兴趣是研究非国家社会团体内部及其之间的冲突——部落、宗族、家族，地区和村庄，教派——这些团体通过共同的文化、经济和信仰体系塑造共同的身份认同。作为军事顾问在印度尼西亚服役之前，我花了一年时间在澳大利亚国防大学外国语学院进行紧张的语言和文化培训，包括在印度尼西亚进行了一段时间的田野调查和学术研究。

从外国语学院毕业之后，我继续进行专业化的培训，然后在1994年和1995年指挥军事顾问团与印度尼西亚军队开展合作，之后数年利用夜晚和周末撰写博士论文。我的博士论文是关于传统社会中的叛乱、反叛乱，以及恐怖主义的政治影响，其中以西瓜哇岛的伊斯兰分离主义叛乱和东帝汶的种族分离主义叛乱为主要研究案例。我并未利用工作时间从事研究，通过有效利用我充裕的年假和作为具备外语能力

的军官每年被允许在“目标国家”内单独旅行的机会，我能够有诸多机会住在印度尼西亚进行实地考察。我利用这些时间研究叛乱分子、民兵武装和激进分子，我经常独自一人在偏僻的山区，与部落和宗教团体领导人及当地民众共处。他们教给我关于游击战和他们所居住的复杂环境的知识，远多于我之前从书中所能学到的。

之后，2011年9月11日来了。

在2004年中期，我撰写了一份研究报告（之后发表在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¹ 试图理解这场大战（所谓反恐战争）和与之关联的“小型战争”之间的关系，这些“小型战争”已在伊拉克、阿富汗、菲律宾、非洲之角、泰国、车臣、巴基斯坦，以及北非爆发。这些在各地爆发的战争主要是传统社会中的游击战争，跨国极端主义组织经常利用后现代方法对其予以资助和煽动。我开始思考反恐战争也许能够通过全球化叛乱这一模式得到最好的理解，它有着国际导向的恐怖组织（基地组织及其分支），他们使用所有全球化工具，采取跨国游击战战略，同时努力组织、聚集和利用各种各样的穆斯林社会群体在当地长期存在的不满，这些群体的组织形式往往是部落的或传统的。

虽然新萨拉菲“圣战者”（jihadists）——任何团体中都存在的一小撮难以捉摸的少数派——经常是坚定不移的狂热分子，但他们能利用地方游击队频繁作战却是因为后者意识到西方势力的存在及其所带来的全球化文化会对当地的身份认同产生致命的腐蚀，这一点让我十分震惊。更经常的情况是，他们与西方人战斗主要是因为我们在入侵他们的地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部分由于追捕恐怖分子使得我们能够与传统的非国家等级社会持续接触——瓦齐尔人（Wazirs）、马哈苏德人（Mahsuds）、库奇人（Kuchi）、阿尔布马哈尔人（Albu Mahal）、贾纳比人（Janabi）和图阿雷格人（Tuareg）²——他们的地理环境和人口构成与西方的国家利益息息相关主要是因为恐怖分子藏身（或据信藏身）于此。

因此当地战士往往成了意外的游击战士——他与我们打仗是因为我们闯进了他的³领地，而非他想入侵我们。他遵循部落战争的民间

方式,这种战争能够通过传统的文化标准,价值和直觉来斡旋。他所从事的(从他的角度来看)是“抵抗”而非“反叛”,更别说战争了。当他在他的家乡和当地山区通过战争保卫传统文化认同的时候,不管他是否被宣传操纵,是否得到域外专家的建议或训练,是否得到外部赞助者的武装支援,他都将成为一个令人敬畏的对手。民族国家组成的现代国际体系(尤其是自封为该体系维护者的美国)与其非国家对手间存在的动态互动,后者存在以下两种彼此离散又互相联系、松散合作的种类——恐怖分子与游击队,后现代与近代,虚无主义者与传统主义者,深思熟虑与意外偶然——这成为使得今天的“混合战争”变得野蛮而复杂的部分原因。

如果这是真的,那么传统的反恐和经典的反叛乱都不足以应对我们当前所面临的冲突。反恐(Counter-terrorism)这一学科(discipline)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该学科关注的是敌人:包括单个的恐怖分子和恐怖组织网络。该理论寻求摧毁这一网络,它是从这一假设进行推断的:消除这一网络就解决了这一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像大部分常规战争一样,反恐也是以敌人为中心的。另一方面,经典的反叛乱理论作为一个学科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但其早已根植于帝国政策和殖民地的小型战争,并且以民众为中心(population-centric),寻求保护民众免受叛乱分子的伤害和影响,并与叛乱分子竞争对于草根阶层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其基本假设是:叛乱是一个大众社会现象,敌人利用和操纵这一由民众的真实不满所形成的社会浪潮。只有通过实施一系列适应具体问题的全方位安全措施,来处理国内广泛的社会和政治因素,并为有针对性的改革赢得时间,才是彻底解决该问题的康庄大道。典型的反叛乱者意识到这些棘手和拖延的冲突会持续数年甚至数十年。显然,我们在许多国家与暴力极端主义的对抗其实是与各种地方游击队及拥有当地同盟的全球性恐怖分子之间的战斗,因此这两种方法都无法奏效,即使相较于传统反恐理论,反叛乱理论更加接近我们的目标。

与这些问题相关的专家人数很少且联系紧密。在2004年8月,一

位美国同事邀请我在一个位于华盛顿特区外弗吉尼亚匡蒂科(Quantico)的海军战斗研究室举行的研讨会上发言,这次会议由詹姆斯·P.托马斯(James P. Thomas)主持,他是一名五角大楼的高级官员和《四年防务评估报告》的写作团队的领导,该报告对美国战略、能力和军力构成进行四年一次的综合性评估。“9·11”事件刚过,精力充沛且富有创造性思维的高级情报人员吉姆·托马斯就在烽烟未消的五角大楼撰写了大量《四年防务评估报告》的文章,他现在正组织一个团队在2005年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分析非常规战争。他邀请我加入这个团队,几周之后,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写信给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参议员罗伯特·希尔(Robert Hill),问美国能否“借用”我一段时间。

在2005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作为这个小型团队的一员在五角大楼深处没有窗户的办公室里撰写《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非常规战争和反恐部分,并努力为反恐战争的一种新方法赢得支持,我们(和其他许多专家)已开始将反恐战争称为“长战争”。⁴我们已取得部分成功:虽然我们的有些观点还需要投票决定或者并未获得资助,而且我们的战略设计(强调一种间接的方法,采用当地的方法以应对当地的问题)并未在军力构成和设备采购的优先事项中得到充分体现,但拉姆斯菲尔德已经认可了我们的许多想法。重要的是,当我们在2004年下半年第一次讨论时仍显得过于颠覆而难以记录的观点,到2005年底已经成为广为接受的明智想法。而那一年,我结交了许多朋友,也与许多美国国防部和情报系统的同僚建立起联系,并发现为数不少的观点相同的人们都在朝着同一个目标机智且勤奋地一起工作。

约翰·内格尔《学会用小刀喝汤》一书的作者,“沙漠风暴”和伊拉克战争中的老兵就是这些朋友中的一个,在他的帮助下,我结交了战略家埃利奥特·科恩,他之后成为我重要的良师益友。⁵2005年中期,埃利奥特邀请我参加了在美国最北边一个风景如画的湖边举行的私人会议。在那次会议上我遇见了中央情报局的传奇式人物汉克·克伦普顿。他是一位研究非洲的老手,在反恐领域有着多年积累下来的丰富

经验，“9·11”事件之后领导中央情报局介入阿富汗。我们发现我们对于这些冲突的观点非常相近，并且对关键性挑战的判断——在全球性冲突中各个地方进行的“小型战争”的复杂性，如何更好地整合国家权势中的军事和非军事方面——十分类似。

几个月之后，汉克·克伦普顿被任命为美国反恐协调者，澳大利亚政府收到赖斯国务卿办公室的请求，询问能否临时借调我到美国国务院作为汉克的首席战略家。澳大利亚再次慷慨应允（这对我在澳大利亚的原组织而言其实意味着巨大的成本和麻烦，但他们显示出一种惊人的灵活性和理解，对此我将一直心怀感激），因而我之后两年就在华盛顿研究反恐和反叛乱政策，并在印度尼西亚、泰国、阿富汗、伊拉克、巴基斯坦西北边境、非洲之角、巴黎、日内瓦和伦敦等世界各地实施这一政策。

这些经验——包括在反恐战争爆发的各个地区进行反叛乱和反恐的实地调研，与各国政府和国际机构进行外交活动，在伊拉克与部落的非正规部队合作共同打击基地组织，以及与当地领袖之间的部落外交——都促使我相信有充足的证据支持我对于冲突环境的分析，并使我能够像在本书中尝试的一样将论据在细节上逐步展开。我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经验也使得我能够断定，虽然许多经典反叛乱手段仍然适用于现代冲突，但我们所面临的是一种混合战争的变体，这使得我们的许多传统观念不再适用。⁶2006年期间，我出版了自己的研究报告，议题是颠覆和恐怖主义，以及这两者在欧洲的关系。⁷

在2007年巴格达增兵期间，我正担任伊拉克多国部队上将彼得雷乌斯将军的高级反叛乱顾问。我的官方职务是一名外交官，但所处理的绝非传统意义上理解的外交事务，至少我所处的环境绝非标准的外交官的环境。我大使馆的几个同事就在我办公桌的一百英尺之内丧生于迫击炮和火箭筒之下。其他人同扎根当地的省级重建队在“铁丝网以外”（也就是深入到社区中）工作，他们最大限度地运用了他们在外交和发展方面的技能，但只能限于部落和村庄层面。一些人定期携带武器，所有人都陷于一种不利的环境，其中谈判和暴力，说服和强迫在各

个层面都相互结合。我三分之二的的时间是与伊拉克军队和盟军、军队和警察顾问、地方重建队、救援人员、情报人员、村落和市区的地方团体领导人一起从事外勤工作，而另外三分之一的时间则用来设计国家反叛乱的方式，应付伊拉克和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训练民事和军事人员用整体政府(whole-of-government)的方法处理冲突，以及影响国际辩论的内容和走向。当地的和全球的因素、部落和后现代的群体、前工业化的和全球化的文化，他们之间的复杂互动绝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得清楚的。

那么，这本书就是我这些年来身体和智识漫游闲逛的产物，这本书分为三个部分，也有三个目标。第一章尝试为目前的冲突模式建立一个概念性的框架，其目标是理顺对于当前和将来战争的复杂讨论，目前这在政府和学术圈还相对清晰，但对公众而言仍是一团迷雾。我尽力帮助非专业的读者更好地理解当前冲突的深层战略逻辑，和推动复杂困惑事件的潜在趋势。在此过程中，我阐述了意外游击战的典型特征，并将其理论化以解释这种趋势。第二章和第三章分别论述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案例，这为第一章提出的诸多概念增加了细节和背景。这两章的目的是依据今天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前线的人们的所见所闻来描述冲突的性质，从而更强有力地证明我们所面临的是一系列的意外游击战，它被跨国恐怖分子利用，并在十几个不同的地方性冲突中得以体现。我希望给读者身临其境的感觉，并且说明今天的战争是如何进行的。第四章用简短的篇幅审视了发生在其他地区的一系列冲突——东帝汶、泰国南部和巴基斯坦——以显示这一现象是如何广泛存在，并识别经典意外游击战的重要变种。我同样考察了欧洲的激进主义和颠覆行为，以此显示我们在中东所看到的激烈冲突其实也同样存在于西方世界。最后一章简要地启动了一项更大的任务，即探索源于意外游击战现象的实际问题。其目标在于考察民族国家，尤其是西方民主制国家能否以及如何适应这种环境，形成应对全球威胁的长期战略，减缓混合战争造成的损害，终结这些冲突，并且在可能的时候避免战争，在需要的时候赢得战争。

关于专业术语的说明

在整本书中,我用“塔克菲理”(takfiri)这个词来描述敌人的意识形态,用“塔克菲理恐怖分子”描述那些用恐怖主义推进这种意识形态的人。这种塔克菲理主义违背了《古兰经》中关于宗教中禁止强迫的教义,相反其认为那些信仰不同于塔克菲理的穆斯林属于异教徒,必须被杀死。塔克菲理主义被斥为伊斯兰教的异端:2005年的《安曼宣言》宣布其为非法,这是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的倡议,他集合了超过500名伊斯兰学者(ulema)和来自伊斯兰会议组织(Organization of the Islam Conference)及阿拉伯联盟的穆斯林政治领导人并在该问题上取得前所未有的的一致认同,“这是由世界各地所有穆斯林认可的最高宗教权威和政治领袖代表他们做出的全体一致的同意”。“基地”组织就是塔克菲理,其成员习惯性地对其他穆斯林进行恐吓,因而他们被普遍认为持有塔克菲理意识形态。我和我在实际工作中接触的大多数普通当地民众、宗教领袖,以及部落领导人都认为,塔克菲理主义最好用来描述当前正威胁伊斯兰世界的意识形态。相较于 jihad, jihadist, jihadi, 或者 mujahidin(字面上的意思是“圣战”或者“圣战者”)这些词,我更愿意用塔克菲理一词,因为前面这些词并未体现出敌人需要的宗教地位,至于 irhabi 或 hiraba 则只体现了基地组织的暴力性质而非其意识形态。塔克菲理同样比萨拉菲(salafi 或 salafist)这样的短语更加合适,后者只是坚信真正的穆斯林应该像最早的四代穆斯林,即“虔诚的祖先”(as-salaf as-salih)那样生活。大部分极端主义者都是萨拉菲,但只有极少的萨拉菲信仰者是塔克菲理,而几乎没有萨拉菲信仰者是恐怖分子:他们虽然大部分是原教旨主义的保守派,但与恐怖主义并无直接联系。

注释

1. David J. Kilcullen, “Countering Global Insurgency,”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28, 4(August 2005):597—617.

2. 头两个是位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界的山地部落,库奇人是该区域的跨界游牧部落,而杜莱姆和贾纳比是伊拉克主要的部落联盟。

3. 虽然在我遇到的部落和传统社会中,男人、女人和孩子作为一个战斗集体在

战争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战斗本身仍主要是男人的工作。

4. “非常规战争”这个词起源于中央情报局,之后被海军陆战队采用。它是2006年《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的一个核心概念,从此之后被广泛运用。不幸的是,正如目前所定义的,这个概念是有问题的;我更喜欢用“混合战争”,其原因我将进一步探索。

5. 其中一个思想家是约翰·A.内格尔, *Learning to Eat Soup with a Knife: Counterinsurgency Lessons from Malaya and Vietnam* (Westport, Conn: Praeger, 2002)。

6. 关于混合战争这一概念,我要感谢哈佛大学的辛普森(Erin Simpson)教授、美国海军陆战队指挥参谋学院,以及新兴威胁与机遇中心的弗兰克·霍夫曼先生。

7. 参见 David J. Kilcullen, “Twenty-eight Articles: Fundamentals of Company-Level Counterinsurgency,” *Military Review* 86, 3 (May-June 2006): 103—108; “Counter-insurgency Redux,” *Survival* 48, 4 (December 2006), 111—113; “Subversion, Counter-subversion, and the Campaign against Terrorism in Europe,” *Studies in Conflict and Terrorism* 30, 8 (August 2007): 647—666。